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01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 深切忧思及战略应对

——基于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手书《三垂冈》的分析

代红凯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北京 122000)

摘要:以古鉴今,以今通古,在与历史情境进行隔空对话中寓寄当下的政治思考和情感思绪,进行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潜在政治表达和情感流露,是毛泽东阅读历史典籍、诗歌辞赋时的要义所在。《三垂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唯一手书了两次的手书,寄寓了毛泽东浓厚强烈的政治思绪。毛泽东借《三垂冈》一诗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其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路线做坚决彻底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隐含着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前途命运和中国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的深切忧思,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予以应对,其中一些想法与做法在当代仍极具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三垂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5-0001-09

诗言志。毛泽东作为熟悉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或独自选读、或向党内领导干部推荐古典诗词歌赋、名人典故,以借古喻今、抒发政治思虑,实现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思想之统一,是毛泽东以不那么激烈的、较为含蓄的外在方式表达自我内在强烈情绪的重要方法。所谓“超读”,即毛泽东在阅读诗词典籍时,往往超出书中的“原意”,从书中挖掘和提炼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方法和策略。如,1960年5月22日下午至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开会,在谈到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时,他说:“因为这个干涉内政问题,就引起我再看一遍《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中就是外国干涉内政相当多,多得很。我专看这一条,专找外国怎么样干涉内政。”^①毛泽东结合特定政治环境有意找寻特定典籍进行阅读并超越典籍原意的这种“超读”现象,

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精彩之处,亦是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致思方向^②。

基于“超读”的研究视野,在毛泽东的阅读史及相关批注中,有一首诗应值得特别注意。1962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一则重要批示后面加写了《三垂冈》一诗并做出重要批语。很奇怪,毛泽东为何会在作出批示后还要加写一首诗呢?且时隔两年之后,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再次默写了此诗。其内在缘由为何呢?目前,关于毛泽东手书《三垂冈》的相关研究,大都将其作为毛泽东感慨三垂冈历史之“奇战”、挥毫此诗之遒劲来解读,但这种解读没有准确结合实际甚至脱离了毛泽东默写《三垂冈》的具体时间、具体背景,显然是不全面也是不够准确的。可以说,《三垂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唯一手书了两次的手书,集中表达了晚年毛泽东与国际社会主

收稿日期:2022-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CKS010)

作者简介:代红凯(1989—),男,河南商丘人,博士,高级编辑、副编审,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②罗建华:《毛泽东的阅读史: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人格魅力的重要维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义运动中特别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路线做彻底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潜诉着其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前途命运和中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深切忧思。对此,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予以应对。

一 借《三垂冈》直抒同修正主义做彻底坚决斗争的政治情感

要了解毛泽东手书《三垂冈》的政治意蕴,首先要全景式地深入呈现该诗基本概况及其涉及的历史情境。《三垂冈》一诗为清朝诗人严遂成所作。原诗为:“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要准确把握毛泽东借《三垂冈》抒发情感思绪的根本旨向,必须先对《三垂冈》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情境有充分深入的了解。

本诗气势宏阔,主要讲的是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和后梁朱温之间的战事。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特别是安史之乱后,陆续出现许多不受唐王朝控制的藩镇,势力最强大的主要有因平黄巢之乱受封河东节度使的李克用和受封宣武军节度使的原黄巢部将朱温。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和朱温虽同是唐末手握重兵的风云人物,但对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的历史态度却截然不同。朱温先是背叛唐朝参加黄巢起义,后又归降唐朝反过来去围剿黄巢农民军,最后又杀唐昭宗、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可见是个随机而变、随利而变的机会主义者,是个无政治道德的人。而李克用却对唐王室忠心耿耿,坚定维护唐朝统治,坚决反对朱温对唐朝的背叛,并多次发起恢复唐室的勤王行动。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承遗志,继续讨伐朱温,最终灭掉后梁。可以说,《三垂冈》之诗所涉历史背景的主题主线就是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后梁朱温围绕“拥唐”“反唐”所进行的坚决斗争。此诗呈现出的广阔的历史空间、精彩的历史史实和鲜明的斗争格调正是准确理解把握毛泽东对《三垂冈》产生强烈精神共鸣、两次手书此诗情感思绪的主线。

在充分了解《三垂冈》的这一历史情境和主题

纲领后,结合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考量、情绪情感,就能比较准确理解毛泽东以此诗言志的旨向。毛泽东第一次手书《三垂冈》是在1962年12月22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当日,批示柯庆施将十月十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〇年八月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材料,印发华东局会议各同志。批示说:“此件很重要,请你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毛泽东在这个材料的最后一页写下了《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①。时隔两年之后,即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关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再次默写《三垂冈》。《年谱》记载,这一天,他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他根据自己的记忆,笔录了《三垂冈》^②。

那么,毛泽东书写此诗的历史背景为何呢?毛泽东第一次手书此诗的时间是1962年12月22日,1962年是中苏论战和中苏交恶加深的一年!特别是在1962年年底,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国际修正主义做了坚决斗争,“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③。1962年冬,苏共领导人利用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有组织、有目的地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1962年1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12月2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459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0页。

弟党也越来越多。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就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直接指责中国的原则和立场。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这一时期一直在外地的毛泽东,精神处于亢奋之中^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对以苏共为首的各种攻击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毛泽东更是勇立潮头,投身其中领导这次论战,对论战中的相关材料和重要文章投入了极大精力。正是在与苏共等修正主义做坚决斗争这一大背景下,情绪激动高昂的毛泽东于12月22日批示印发了《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材料,并在材料的最后一页上默写了《三垂冈》。

将《三垂冈》置于中苏论战以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鄙弃和批判这一背景之下,就很可能理解他此时书写《三垂冈》的意蕴所在了。尤其是毛泽东将《三垂冈》附在《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材料之后更是意味隽永,它实现了历史和现实、历史与政治跨越时空的交错融汇。在这则材料里的“列宁”“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和《三垂冈》中的“唐朝”“后唐”“后梁”“朱温”“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后唐灭梁”交互映射,被毛泽东赋予了别样的政治意味。很显然,《三垂冈》中的唐王朝意指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定拥护唐王朝的李克用代表着在帝国主义时代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列宁、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英雄立马起沙陀、只手难扶唐社稷),坚持与背叛唐朝的后梁朱温作坚决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李存勖潜指继承社会主义事业、与“修正主义”做彻底斗争并终将取得最终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风云帐下奇儿在)。而随利而变,先后背叛黄巢和唐王室、最后灭唐建梁的朱温则意指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者。可以说,毛泽东默写《三垂冈》并不是纯粹的历史感怀,历史凭吊,而是以古喻今,以历史中的传奇史实和战事集中寄托自己关于当时中共与苏共围绕怎样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并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心。

而毛泽东第二次手书此诗的时间是1964年

12月29日。毛泽东为何此时又想起这首诗呢?这仍需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和理解。1964年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的一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在全国城乡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相关问题,目的是要制定一个农村社教运动的文件。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开展,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也正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语言冲突,分歧一步步加深并公开化,此后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并逐渐形成了党内已分裂成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且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代表的错误认知,这种判断继而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这一历史背景恰恰是理解毛泽东第二次笔录《三垂冈》的真实意旨所在。因此,毛泽东在这次使他十分不愉快、不顺畅、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激烈斗争氛围的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一天,重新想起并默写《三垂冈》,绝不是一时兴起挥毫泼墨凭吊古人,也不仅仅是抒发对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之失望的悲切之感,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斗争旨向。承接中苏论战时毛泽东在此诗中融入的与修正主义者做彻底斗争的激昂情绪情感,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再度想起此诗,并执笔挥毫,以此诗抒发丰富、激烈、悲愤的所思所想,真是此时此刻又恰如彼时彼刻。毛泽东将与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方式方法的争执上升为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之争,一定又让他想起了中苏论战时与修正主义代表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而这种争执又是原则性的,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毛泽东则是绝不让步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劝刘少奇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但即使后来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还是不肯认同他,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1页。

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①

二 借《三垂冈》暗抒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

面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出现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者以及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国际形势,加之党全面执政之后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可以说,毛泽东两次手书《三垂冈》,既表达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与赫鲁晓夫等人作坚决彻底斗争的信心信念,同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使他也不得不去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去考虑谁能够在他百年之后面对“朱梁跋扈”时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这一“身后大事”。赫鲁晓夫等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弃,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使身处“鼓角灯前老泪多”^②生命阶段的毛泽东对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陷入深深的忧思之中,“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③。

(一)对赫鲁晓夫等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失望和愤慨

如何在波谲云诡的复杂国际局势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考的大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产生了巨大分歧。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问题上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且给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蒙上了阴影。毛泽东在《三垂冈》中将赫鲁晓夫潜指为反复背信弃义的“朱温”,对其鄙弃、失望、愤慨之情一览无遗。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

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缺乏原则性和战略性,他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④“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⑤此外,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代表苏联高薪阶层的利益,对西方国家谄媚示好,背弃了人民立场,“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⑥。而且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⑦。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倒行逆施致使后来戈尔巴乔夫等人吹捧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有了社会土壤。可以说,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出现赫鲁晓夫等机会主义者及其种种行径,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极大忧思。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赫鲁晓夫等人向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向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共产党,敲响了警钟。

毋庸讳言,尽管在当时中苏两党关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激烈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⑧。

①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②1975年5月,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再次提及《三垂冈》一诗,他说道“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并解释说“这就是此时此刻的心情”。——陈晋:《毛泽东之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1、2274页。

(二)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警示

和平演变特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采用意识形态渗透等非武力手段进行颠覆活动的新战略。其首倡者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①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

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以及赫鲁晓夫对西方的示好态度,引起了毛泽东极大重视,他以战略家的敏锐和洞察力,很快抓住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之实质。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针对杜勒斯的讲话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②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讲话中说:“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目的是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国际战略形势,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惕,促使他慎重考虑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风云账下奇几何在”成为晚年毛泽东的生命焦虑。毛泽东在中苏论战期间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

“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④需要指出的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实施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⑤。

(三)对党全面执政后产生消极现象的担忧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根本旨向。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居安思危,他意识到要尽早防止党内可能会出现腐化变质、意志衰退、官僚主义等消极现象,以防重蹈历史周期律的悲剧。他不止一次表达出对党内消极现象的担忧和不满:“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进城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⑥毛泽东担心党内蜕化变质的极少数人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就会成为党变质褪色的社会基础。他指出:“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⑦这种对党蜕化变质的防备心理在毛泽东晚年愈加激烈。正是在意识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党蜕化变质的问题之后,毛泽东才开始谋划发动“文化大革命”。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王卓超表达了心中的忧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9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5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①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②在毛泽东看来,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如果党蜕化变质,走资本主义道路,让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这正是毛泽东根本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但旧中国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西方世界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文化侵蚀,党内腐化变质现象的存在,使我们党和政权时刻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因此,怎样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就成了晚年毛泽东最深切的生命焦虑。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最后认为只有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导致混淆敌我的局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③。但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于砥砺党的初心,牢记党的使命,不断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则具有恒久的启示和价值。

三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举措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社会主义前途

命运的深切忧思,毛泽东从来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在坚持“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下,采取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战略准备和应对,其着眼点在于党有变质褪色的可能性,对此做好各种应对以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毛泽东所做的战略准备主要有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并确立领导核心,坚决彻底反对官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

(一) 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并确立领导核心

“风云帐下奇儿在”,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④,是毛泽东永葆党的本色的最重要战略举措。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培养接班人这一战略,而且对培养合格的可靠接班人设定了标准。1964年6月16日下午,在看完部队的汇报表演后,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在谈及培养接班人问题时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⑤1964年7月和8月,毛泽东对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

①马社香:《“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超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6—235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①毛泽东还特别重视通过社会实践来锻炼接班人,“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②囿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理论在其后的历史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左”的偏向,但培养可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被党确定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举措坚持下来,这是毛泽东的重大贡献。

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坚定方向,培养接班人,其中要特别重视打造一个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的核心领导层。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③1965年8月11日,他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特别强调:“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④毛泽东这些论述对新时代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领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伟大政治意义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二) 坚决彻底反对官僚主义,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他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灰尘”和“污毒”,是搞特权、脱离群众、贪污腐化、滋生享乐主义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治党治国治军必须常抓不懈和切实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是低级趣味的表现,它的实质是脱离群众,违

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个官僚主义阶级,使党变质变色。

在提出和实施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发动群众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关于发动群众整风,他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⑤而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更是毛泽东心中的美好理想,他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⑥“做一个共产党员,要跟工农接近,要向工农学习。如我们现在这些人不向我国工人、农民学习,那就不行。情况变了,工人、农民有新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脱离工人、农民。所以我们号召干部,除了体弱有病的极少数人,统统要去跟工人、农民接近。”^⑦干部参加劳动,既是干部走群众路线,了解群众需求,加深群众感情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使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认为,只要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就会瓦解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中的有些内容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过分估计的基础之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产生了“左”的影响。

(三) 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夯实社会主义力量根基

毛泽东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438页。

修正主义理论、路线、人物的出现是对一定社会阶层的反映。因此,如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那就要从社会基础上着手,一是在经济领域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另一个就是加强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才能夯实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毛泽东对此有着坚定的信心。他明确指出:“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①“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路线正确,人民总是会逐步觉醒起来,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不管有多少个赫鲁晓夫,又不管印尼右派怎么样猖狂,要想把人民革命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毛泽东是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设想也部分地脱离了实际,影响了最终成效。

此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对领导干部子女的严格教育。他把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强调领导干部子女如果高高在上、互相攀比、疏于管教,将会对社会主义大厦根基造成潜在的重大威胁。他在点评《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一事时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③为此,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家人遵守党纪国法,对党内主要领导干部继承共产党人优良作风严格教育子女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四) 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污蔑、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和平演变

势力的惯用手段,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层逐步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观,能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作坚决彻底的斗争,能否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开拓现代化道路,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坚定方向、拒腐防变的关键环节。

为此,毛泽东强调,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理论辨别力。毛泽东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否认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④二是要敢于和歪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坚决彻底的斗争。毛泽东指出:“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保卫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有时成为潮流,反对它的居于少数。”^⑤三是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为突破苏联模式,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做出了艰辛探索。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⑥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探索中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等等,更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这些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197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此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①，“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②,而“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③。囿于当时的时代环境,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即关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内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诚信仰和自信底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般原则的阐释和坚持,对于维护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继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④当下,世界形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毛泽东两次手书《三垂冈》,其内在的丰富意蕴及关于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举旗定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继续推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重大转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Mao Zedong's Deep Worry and Strategic Response to the Future and Fate of Social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 Twice Handwritten *Sanchuiga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AI Hong-kai

(Editorial Office of *Leading Journal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Beijing 122000, China)

Abstract: Learning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connecting the ancients with the present, embodying the political thinking and emotional thoughts of the moment in the dialogue with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carrying out a kind of potential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that “silence is better than sound”, is an important purpose of Mao Zedong when he reads historical books and poems. As the only poem written by Mao Zedong twi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nchuigang* embodies Mao Zedong's strong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poem, Mao Zedong concentratedly expresses his determination and confidence to fight thoroughly against Khrushchev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secretly complains about his deep concern for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caus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t successors. In this regard, Mao Zedong takes a series of strategic measures to deal with it, some of which have much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contemporary times.

Key words: Mao zedong; *sanchuigang*; socialism; Marxism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2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